



南强史学丛书

庄景辉 著 / 译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Quanzhou
Port and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泉州港考古与 海外交通史研究

岳麓书社





福建博物館

*An Archaeological Illustration on Quanzhou
Port and Maritime History Museum*

泉州港考古与 海外交通史研究





南强史学丛书

庄景辉 著 / 译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Quanzhou
Port and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泉州港考古与
海外交通史研究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庄景辉著/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ISBN 7 - 80665 - 689 - 8

I. 泉... II. 庄... III. 海港—交通运输史—研究

—泉州市—古代—文集 IV. F55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8008 号

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

作 者: 庄景辉

责任编辑: 饶 豪

封面设计: 黄 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5616(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60 千字

印数: 1—3,000

ISBN 7 - 80665 - 689 - 8/G · 494

定价: 33.00 元

承印: 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北路银太纺织厂双鱼楼

邮编: 410013 电话: 0731—89059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出版缘起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已经走过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她建立于 1921 年，是厦门大学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的本科毕业生，数百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知名摇篮。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探索和薪火相传，我系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显著的办学特色，现拥有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心、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 6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8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并与海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比较稳固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系在教学与科研相长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发扬传统研究特色，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生长点，科研论著迭出纷呈，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同仁的瞩目与赞誉。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系的教学科研事业，更好地展示和交流有关成果，我们特推出这套丛书，以期与同志友好为繁荣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科而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2003 年 8 月

目 录

泉州子城址考	(1)
泉州罗城址考	(20)
泉州宋代祈风石刻考释	(38)
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与海外交通	(54)
泉州出土海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71)
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	(82)
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	(103)
莆田圣墩顺济祖庙考	(115)
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考	(142)
泉州郑和行香碑考	(165)
郑和舟师驻泊福建的航次与时间	(182)
随郑和下西洋的福建人	(197)
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	(213)
再论郑和宝船	(240)
郑和下西洋是什么	(251)

2 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

明初三十六姓迁居琉球中的蔡襄后裔	(269)
泉州在明琉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	(297)
明初福建的海防建设及其遗迹	(310)
明清时期泉州青花瓷的生产与外销	(355)
明末清初的福建海商与陶瓷贸易	(361)
论明末清初福建与日本陶瓷贸易的研究	(377)
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384)
东南亚初期华侨社会(960—1279)*	(404)
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	(436)
宋元时代的船舶*	(483)
陶瓷之路*	(513)
日本美浓桃山陶的生产及其与中国漳州窑的关系*	(533)
郑和分航访问也门*	(550)
明治时期旅居日本的华侨*	(570)

泉州子城址考

往读地方志乘，见载泉州古城址者，皆语焉含混且互相矛盾，对其创建人、时间，以及垣壕基址，未获其详。同时，随着历史的变迁，城垣或堕废、或毁拆，已经荡然无存；城壕或湮淤填塞、或房舍掩压，所见遗迹无几，难得考古实物之资料。可见，泉州古代城址的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1980年，陈允敦、庄为玑两先生在《泉州文史》第二、三期合刊上，分别发表了《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1]二文，首先对泉州子城和罗城遗址作了考察和论证。然而，他们所得的结论却是不同的，分歧的焦点在于子城、罗城的创建年代。前者认为“罗先子后”，后者指出“子先罗后”，各执己见，莫衷一是。1985年以来，双方又撰文就所持之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辩^[2]，把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这样一来，对泉州古代城址的

探讨，便愈显必要了。

从笔者所涉猎的有关资料来看，泉州古城址的问题，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真相已经大白，问题已经解决。笔者认为，目前的讨论乃至争辩，仅仅是泉州古城址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因此，笔者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索，抛砖以引玉，来推动泉州古城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本文先就泉州子城的形制、创建人及其年代、存在的时间略作考证和辨析。

一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载子城之形制云：

子城在罗城内……周三里百六十步，为门四：东曰行春，西曰肃清，南曰崇阳，北曰泉山。……子城外壕，环绕子城，广深丈余，壕皆有桥。

府志对于子城规制的这一记载是极其简略的。如今城垣已不复存在，四城门楼中的北门楼“早废”，东西南三座，经历代重修保留至抗战期间也被拆去了。^[3]不过，在民国十一年（1922）福建泉州工务局测量队制、泉州南街同文斋印的《泉州市图》上，则标有东西南三城门楼的位置，那座早废的北门楼，据说原址上仍筑有称为“泉山宫”的小神龛。由此倒可见着子城四门楼的明确位置，即东之行春门位于今门楼巷口东街上；西之肃清门位于今井亭巷口西街上；南之崇阳门位于今承天巷口中山路上；北之泉山门位于今孝悌巷口中山北路头。这就为我们揭示了子城的坐落方位及其大致范围。但是，要了解它的具体形制，在城垣已无迹可考的情况下，只有抓住“子城外壕，环绕子城”这一特

征，借助于子城壕的有关记载及其遗迹去追寻。

方志中对于子城壕的记述，万历府志过于简略，乾隆府志、县志记之有误，唯道光九年（1829）修纂的《晋江县志》，不仅所载较详，而且对前志的错漏之处作了“改订”。下面，根据县志所载，以子城北门外位于泉山铺示现庵前的泉山桥为基点分述之。

自北向东而南的城壕，由示现庵内后壁穿出，经白狗庙后，出弥勒宫左，再伏其势由府城隍照墙外接梅花桥。梅花桥在广平仓口，壕由此南折，从小涵透至霞田池下河，延与行春门外的迎春桥相接。迎春桥原位于近美里巷口，桥壕俱不存，桥之向北水关在相公巷中营守备署门路内，向南水关在鹦鹉山窟，嘉庆九年（1804）浚沟向北水关尚存。迤而东南至登瀛桥，桥在桂檀巷尾伯府埕头佛祖宫前，宫直跨壕上，水从鹦鹉山窟穿承天菜园乃至北桥，下用横板上用小板直铺，以不误行者，宫后壕甚明显。

自北向西而南的城壕，由泉山桥至裴巷东新街西清军驿前的坂仓桥，桥存壕塞，沟路已失，水势从花山涂窟而来，下接肃清门外井亭巷口的肃清桥。此桥壕俱存，但为民居压塞。迤而西南至放生桥，桥在梦果巷（即花巷）尾真济宫前，宫直跨壕上。

南壕出梦果巷口，下入小泉洞巷，过直跨壕上的登贤桥宫后，由傅池亭出清源书院口，下一桥入书院池迤至登瀛桥，而后由登仙桥（即离井桥）出通淮门。^[4]

以上是《晋江县志》记载的距今一个半多世纪时的子城壕状况。可以从中看到，早在一百七十多年以前，子城壕便难窥其全貌了。但是，尽管有的“桥存壕塞”或“桥壕俱不存”，有的“宫直跨壕上”或“民居压塞”，已经“缺环不周”，可它的来龙去脉却是清楚的。由壕环城而推之，子城垣大体上由东西南北四城门作横向趋直线而筑，相交处折角成周，整座城之平面，基

本上呈东西稍窄南北略宽的长方形。城址就坐落在以今钟楼偏东为中心的地方。城之垣高基广无从稽考，从近代以来陆续出土的刻有“子城”字样的残砖看，仅知道它曾是用砖砌筑起来的。

二

子城的创建时间及其创建人，志书记载不一。所见有这么三种说法：其一，万历《泉州府志》记时不记人，云“唐天祐二年筑”^[5]；其二，乾隆《泉州府志》等记时又记人，云“相传唐天祐三年节度使王审知筑”^[6]；其三，乾隆《晋江县志》既不记时且不记人，云“子城筑于唐贞元以前，年月莫考”^[7]。要明辨其是非，还得回到志书中去找答案。

万历府志卷十《官守志》载唐刺史苏妙传云：

苏妙，字观妙，南海人。大历中刺泉，有惠政，有鹊来巢行春门楼，妙出鹊每集车盖，州民颂歌之。

此云白鹊所巢之“行春门楼”，当指子城东门楼无疑。查乾隆府志卷二十六《职官》，苏妙于大历四年（769）任泉州刺史，说明至迟在769年之前，这座周三里余的州城即后来所称之“子城”便已经出现了。

可列举的诸如此类的例证很多，但最有力的当推有关“北楼”之记载。乾隆县志卷十五《杂志·古迹》云：

北楼，在子城泉山门上，唐贞元九年，守席相重建，欧阳詹有记。

这是说明子城非建于唐天祐年间的最好证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唐贞元九年（793）席相重建，欧阳詹为之作记的“北楼”，是否为子城泉山门上之北楼？有的人便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是在罗城的朝天门。^[8]对此，只要参阅乾隆府志的如下记载，其错误就昭然若揭了。卷十二《公署》云：

州治在双门正北，明为泉州卫，今为提督署。……治后有北楼，即欧阳詹所记者，王十朋重修。

文下接载《十朋自为记》云：

……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数日，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将压邪，众木以支之，询之乃北楼也。惕焉，不敢睨矧敢登？有碑，尘如积，漫不可读，乃四门所作之记。叹息久之。……明年春二月，建贡院，秋八月落成，得余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月丁卯，董役者以讫工告，与同僚三四辈登而四顾，山川城郭之富，尽在目中，亦一州之壮观也。

无须再作更多的解释，以上的记述足以表明，唐贞元九年席相重建、欧阳詹作记的北楼在子城泉山门上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乾隆县志早就对某些志书的错误记述作过考订，批评“隆庆志谓即罗城之朝天门、《闽书》谓在衙城^[9]之上”的诸失实之说，写下了“北楼即泉山门之楼无疑”的结论^[10]。

万历、乾隆两府志有关子城创建时间的记载显然有误，而乾隆县志所云“子城建于唐贞元以前，年月莫考”是言之有据的。子城建于唐天祐三年（或二年）一旦被否定，节度使王审知筑子城之说自然也就难于成立了。实际上，在此十几年之前，王审

知与泉州便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景福二年（893）王潮攻取福州，王审知随之入城。他被命为福建观察副使，后潮病由其权知军府事，及乾宁四年（897）十二月潮歿，审知继位，即开始了他对福建的统治。^[11]作为一位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他所精心图治的当然是整个福建，致力经营的是福州（如开甘棠港于黄岐、筑罗城于福州等）而不是泉州。当时，泉州虽是一个重镇，但统治着这里的是王审邽。至天祐二年（905），审知“墨敕”王延彬权知泉州军州事。在这位被誉为“招宝侍郎”的年轻刺史先后26年的治理下，泉州曾出现了“岁屡丰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局面。因此，即使在唐天祐三年真有建造三里州城之举，恐怕决不会也没有必要由福建观察使亲自来主持一个州一级城垣的建设。况且把握着这里权力的是他“墨敕”的颇有才干的侄儿王延彬。真不知道创建泉州子城的功绩是如何把它记在王审知之名下的。别说是子城的创建时间不在唐天祐间，就创建人为王审知而论，也是全然不可能的事。

然而，陈允敦先生却抱定“府志所云‘子城相传为王审知建也’之说，较可接受”^[12]，并于实地踏勘找到了不少依据来加以论证，从而确立“罗先子后”的观点。我们不妨列举其主要论据剖析如下。

其一，他说子城是从密集的民房中强行拆出一条隙地供挖壕与建垣的，因此不得不迁就民房和回避权贵第宅而造成曲折^[13]。姑且不论凭着历经变化而留下来的城壕遗迹竟能看出城垣的“小曲折”不知带有多少的可靠性；姑且不论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历史上的建城造郭竟不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制约而是由于迁就民居和回避官宅而舍直就曲，就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也是绝不可能的。按志载子城壕深广丈余，垣高虽不见载，但以一般作估墙基应为两丈左右，加之必需留足可供挖壕扬土、筑垣搭架和堆放

沙土（或砖石）等工程建设的空地，所动用的土地，何止是“一条隙地”，其宽度至少也得在五六丈以上。要在民居中拆出如此之宽而又周三里余的这么一大片面积，特别是像他所说筑城时“市内已相当繁荣，民居拥挤”的状况下，可以想像，势必引起居民的怨声载道，而这种劳民伤财的加深与民众矛盾的做法，是和王氏政权“保境息民”的政策相形见绌的。好了，就算是能予强行拆出的话，又何需迁就某些民宅呢？至于权贵府第，既然是王氏统治的天下，建筑以自卫，还能有谁称得上“权贵”让城垣避开府第以致“破坏其方整性”？又说是对立派所居，那就更是当拆勿论，不可容忍它的存在了。

他“还可以从现存古街道在子城内及古子城外遥遥相对，取得实证”，说明是拆建子城后，原有街道被截断的痕迹，而且子城毁后至今已有千年有奇了，古路尚无法复原。^[14]他列举了东、西、南墙被截断的例子。但据笔者看来，这只不过是论者对着《泉州市城区图》而作的“纸上谈兵”，假如 he 去实地踏勘，或许便可发现并不是自己所想像的。如他说东垣被截断者有：1. 卫校北墙对中营下巷；2. 彩笔巷遥对庄厝巷；3. 新府口巷遥对何衙埕；4. 敷仁巷遥对何衙埕^[15]。此四者不消说：1 无巷可对，就是后三者，2 间隔的是府后山，3 间隔的是鹦鹉山，4 间隔的是承天寺，可以说彼此并不相干，只不过是“遥遥相对”罢了，怎么能说是因子城垣壕而造成的？由此可见他所举例子系牵强附会之一斑。

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还说这些迹象是在子城废后一千余年仍然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的。据论者所云，子城仅存在了 72 年，是个短命之城。^[16]这 72 年给这个城市的布局所造成的影响，竟然比在其废去之后的一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变迁还要大，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时代海外贸易兴盛，港市建设繁荣，泉州城不断地改变

着自己面貌的这样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今的市区街巷坊里之称，基本上还是宋代（确切地说是南宋）及其以后才出现和逐步形成的，难道论者所说的状况是可能的？

其二，他说城建布局，要求对称，子城东墙原应建于南俊巷，但实际没能这样做，说明有所勉强^[17]，是城址不能自由选择的结果^[18]。这一点，恰恰说明子城不是从民居中拆建的，正是因地制宜建造起来的反映。有必要在这里提醒一下论者的是，当他在强调子城布局必须对称时，自己在《泉州古城址平面图》^[19]上绘出来的、被考定是建于唐开元、天宝间的罗城有对称吗？罗城布局的不对称，大概不致于也是迁就回避民居官宅之故吧。他认为造成子城布局不相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将鹦鹉山的王审知花园包入城内，并视之为王审知筑子城的重要依据^[20]。把东垣建于门楼巷包鹦鹉山，显然是筑城者出于便利防御的军事目的之考虑。该山是周围地方的高埠之一，总不会把东垣筑于南俊巷，而将鹦鹉山撇在垣外边上，给敌人留下攻城之便。说鹦鹉山是王审知的花园，不知出何据典，大概是论者求依据心切，把这里原是“留从效之蓝园”^[21]当作王审知花园而混淆起来了。就算是的话，正如前面已经论及，至天祐三年，它与王审知也早就没什么关系了。

其三，他说出土的子城砖非修城砖。砖铭有“使”字是上级派专“使”来主持鼎建^[22]。1936年在原子城遗址出土上部残缺印有“[缺]子城砖使立”的城砖一方^[23]。陈允敦先生把它视为是王审知建子城的一个重要依据。“使”字被理解为上级派来主持鼎建子城的专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使立”当作“置用”之意解似较合适，不知陈允敦先生以为如何？他进而推之是五代鼎建用的砖。不知道陈允敦先生是从砖的质地、规格（大小尺寸），还是从砖铭的字体、句型，或是其他哪些特征来

判断的。连见都没有见过这方城砖，只凭自己的既有观点来妄加推论，而这种推论，无论是砖的年代，还是砖的性质，都是不足为据的。后来，他好不容易地查到《闽中金石录》的有关记载，便迫不及待地于另一篇文章^[24]中据此而把“使立”修正为“使内”，可惜的是陈允敦先生却没能对“使内”作出应有的解释。1981年夏，泉州体育场室内球馆地下工地（原子城址）又掘获上印有“〔缺〕衙子城砖使立”残城砖一方^[25]。事实证明，陈允敦先生的“修正”适得其反，而这种舍弃出土实物偏信文献资料的做法是历史研究之一大讳也。

顺便于此一并论及，有人对近年出土的这方残城砖作了考证，得出了“新发现的‘衙子城砖使立’的古城砖，应为唐天祐二年所制作，由此，则知泉州先有外城，后衙、子城同时创建，外城遂称罗城”的结论^[26]。实际上，这一结论只不过重蹈覆辙于陈允敦先生“罗先子后”的观点，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把志书中所出现的唐太和以前有关“城”的记载，不加任何分析，一概视之指的是罗城，而毫无根据地把出土的古城残砖断定为唐天祐二年所制作，即承认了王审知建子城之说，其谬误所在，可见于笔者以上之论证，此不赘述。至于衙城的创建时间，倒无须多作“考证”，万历府志所载欠详，乾隆府志等载之则甚明确，系“留从效筑为开府建牙之地”。怎么能在一方残砖上见记“衙”与“子”并提，就可推断衙城与子城“同时创建”呢？砖铭所云尚待诠释，但据此论证两者是同时创建，恐大欠妥。总之，论者的见解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其四，他说王审知所筑的子城之“泉州墙”（北垣）是利用唐州城（罗城）之北垣之中段，二城共一“北楼”。这是陈允敦先生在最近撰写的《泉州子城和罗城的创建孰先孰后》一文中抛出的新看法。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是付出代价的，

对自己颇费苦心进行踏勘而于《泉州古城址踏勘纪要》中作过论证和于《泉州古城址平面图》上描绘出来的沿革城图，在很大程度上作了自我否定。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这一看法，是陈允敦先生在发现自己所确认的唐贞元九年席相重建、欧阳詹为记的北楼在朝天门上这个论证“罗先子后”的重要依据被证明是错误的时，为了固执自己“罗先子后”的观点而不得不进行的修正。虽然他为自己经过修正而推出的论点颇为得意，也找到了许多“确凿的证据”力图令人信服，但正如一位颇有造诣的学者曾经说过，“一旦你为自己确立了错误的论点，那么，你所为之而找到的论据越多，你的论点偏离史实就越远”，我觉得陈允敦先生便是如此。

首先，子城、罗城共一北墙，从建城的目的和作用来说，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大家知道，筑城是为了防御，特别是内城外郭的建筑，虽说前者是“为君”，后者是“守民”，但实质上是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防御敌人的攻侵，做到重重防卫而兴修的，起着外郭一旦被攻陷，内城尚可抵挡以求援兵的作用。无论是“子先罗后”，抑或“罗先子后”，内外二城必然都是分离的。这是一般的常识，是建城所普遍遵循的通例。然而，若是子城、罗城共一北墙，如何能起到重重防卫、层层御敌之作用？假设敌至，只要选择北垣攻入，不就可直捣“老巢”了。像这样的子城之建设是没有多少军事意义的。王审知也好，其他筑城者也好，应该不至于那么愚蠢。陈允敦先生要是懂得这个道理，大概就不致于有这一强加于古人的见解了。

其次，就他再次踏勘为子城、罗城共一北墙所找到的依据而言，完全是为满足这一经修正的错误观点之需要而臆造出来的。他划出一道“东起于中营下巷横过相公巷，斜经马鞍山东北坡，沿米仓巷北转西折过释仔桥，转南、折西、过进贤至烟丝厂西”